

注石門文字禪

上冊



〔宋〕釋惠洪 著
〔日本〕釋廓門貫徹 注
張伯偉 郭醒 童嶺 卞東波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注石門文字禪/(宋)釋惠洪著;(日)釋廓門貫徹注;張伯偉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2.2

(日本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ISBN 978-7-101-08233-3

I. 注… II. ①釋… ②釋… ③張… III. ①宋詩-選集 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北宋 IV. 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02828 號

責任編輯:馬 婧

日本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注石門文字禪

(全二冊)

[宋]釋惠洪 著

[日]釋廓門貫徹 注

張伯偉 郭 醒 點校

童 嶺 卞東波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58½ 印張 · 4 插頁 · 1050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178.00 元

ISBN 978-7-101-08233-3

覺範禪宗像



註石門文字禪卷第一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 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睂東巖旌善堂 校

大日本關東路下野州那須郡前住大雄寺

沙門釋廓門貫徹 註

古詩

謁狄梁公廟

唐書列傳第四十曰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云歲中斷久獄

萬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懷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

前言

張伯偉

《石門文字禪》是北宋詩僧惠洪的詩文集，在中國向來未有校注本，因此，日本江戸時代的僧人廓門貫徹的《注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就成為迄今為止惟一的校注本。在當時日本佛學界，「四海禪人喑喑揚言曰：箋於石門，唐山無人而搏桑有之者，自公始」^(一)，頗引以為傲。此書收藏於日本京都財團法人禪文化研究所和東京駒澤大學圖書館，知者不多。二〇〇〇年十月，日本臨川書店出版了由柳田聖山和椎名宏雄所編《禪學典籍叢刊》，第五卷即據禪文化研究所藏本影印收入，始為學界所聞，但研究者頗罕^(二)。本文擬圍繞廓門其人其書，舉其犖犖大者，謫論如下。

一、廓門貫徹的生平及交游

有關廓門的生平資料極為罕見，茲綜合以下三種資料，即一、駒澤大學內禪學大辭典編纂所編《禪學大辭典》（三）；二、市古貞次等編《國書人名辭典》（四）；三、椎名宏雄《注石門文字禪・解題》（五），並結合廓門的《注石門文字禪》、《護法集碎金》等資料，對其生平及交游簡述如下：

廓門貫徹（？——一七三〇），日本曹洞宗僧侶，法諱貫徹，道號廓門，又號屋愚子。生年不可考，少時親炙獨庵玄光（一六三〇——一六九八）之學。嗣法於下野（栃木縣）黑羽大雄寺十二世幽峰玄，其後嗣師席為十三世住持。晚年居江戸正覺寺。早年在諫早（長崎縣）天祐寺講《夾注輔教編》，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輔教編新臻注》，於貞享三年（一六八六）刊行。從大雄寺住持的位置退下後，以二十多年的時間從事《石門文字禪》的注釋工作，於寶永七年（一七一〇）完成並付梓。享保十四年（一七二九），對獨庵玄光之《護法集》加以注釋，撰成《護法集碎金》十四卷並付梓。翌年一月二十七日示寂。

從廓門的師承來看，他頗受獨庵玄光的影響。廓門並非嗣法於獨庵，屬於私淑弟子

的性質。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可能更有一種效法的自覺性。總體來看，至少包括兩方面：其一，獨庵是江户初期曹洞宗著名的學問僧，尤其擅長漢文寫作。其文章在當時與石川丈山的詩、北村季吟的歌、伊藤仁齋的儒學、佐佐木志頭磨及北向雲竹的書法相齊名，被公認為第一流的人物。又崇尚博學，於書無所不窺，其一生重要著作集中為《護法集》十四卷及《續編》二卷。廓門白云「少時親炙於師，聳懼學博而才弘，識高而文偉。遐覽載籍，侈游墳典」^(六)，故其注釋《護法集》，就特別抉發其中出於外典的術語和概念。其二，在獨庵的時代，臨濟宗和曹洞宗還存在著相當的對立，「今日日域洞濟兩派之徒，各誇耀所長，更相毀辱」。「兩派之不相容，如水火之不同器」。而獨庵則強調「佛法有徧參之軌則」，將兩宗同視作「曹谿之胤」。提倡「各補其所短，而無誇其所長，感其法派之同源，顧其祖宗之一體，痛疾相救，則宗門之幸甚也」^(七)，以融合的立場看待之。廓門顯然也接受了這一立場。

從《注石門文字禪》的序、讚、題辭來看，此書分別有曹洞宗的己山道白、臨濟宗的無著道忠撰序（分別撰於寶永七年的仲春和首夏），曹洞宗壽昌派的蘭山道昶題辭（撰於正德三年，一七一三），黃檗宗的月潭道澄讚語，可知廓門不僅交游很廣，而且能超越門派之見。尤其是道白和道忠，是當時禪林非常重要的人物。

道白（一六三六—一七一五），曹洞宗僧人，備後（廣島縣）人，號卍山。十歲就龍興寺之一綫道播祝髮，以後一直跟隨參究。十七歲，參高秀寺文春，受鉗鎚，晝夜忘其寢食。一夕對月打坐，忽然身心透脫而徹悟，乃有「夜深雲斷天如洗，徧界無塵礙眼光」之頌。寬文三年（一六六三），二十八歲的卍山讀到道元（一二〇〇—一二五三）禪師《正法眼藏》中的《嗣書》卷，深感當時宗門積弊而生改革之念。四十三歲，初次與月舟宗胡（一六一八—一六九六）相見，機緣相契，遂嗣其法。延寶八年（一六八〇）以月舟之後任爲大乘寺住持，十一年後退居。元祿十三年（一七〇〇）與梅峰竺信同上江戶，思正宗統之亂，爲宗弊改革而訴於官衙。元祿十六年，經過四年法廷鬥爭，終於獲勝，其後以復古老人自稱。編卍山本《正法眼藏》。正德五年八月十九日示寂，世壽八十。嗣法門人三十餘人，開創地八所。有《卍山和尚廣錄》，後人仰爲曹洞宗中興之祖。此外有注《如淨語錄》二卷，又有《參同契·寶鏡三昧書紳稿》二卷、《禪戒訣》、《禪餘套稿》、《對客閒話》、《東海一滴集》、《洞門衣衲集》、《答客議》等多種著作（八）。

道忠（一六五三—一七四五），臨濟宗僧人，號無著，又稱照冰堂、葆雨堂。但馬（兵庫縣）人，幼入出石（兵庫縣）之如來寺，後入龍華院，投竺印祖門（一六一〇—一六七七）並爲其養育。後歷參各地諸師，二十五歲時，竺印示寂，乃繼其位爲住持。寶永四年（一

七〇七）爲妙心寺住持。享保七年（一七二二）於龍華院退休，埋頭著述。道忠是江戶時期傑出的臨濟宗學問僧，遺著三百七十四種，九百十一卷。他首次對衆多與禪門有關之經典、祖錄加以注解，以妙心寺爲中心對各種禪籍下徵文考獻的工夫。代表作有《禪林象器箋》二十卷、《葛藤語箋》十卷、《小叢林略清規》三卷、《百丈清規左鱗》二十一卷、《虛堂錄犁耕》三十卷、《正法山誌》十卷、《葆雨堂虛凝集》二十卷、《正法眼藏僭評》一卷等。

蘭山道昶（一六四九—一七四二），曹洞宗壽昌派僧人，字蘭山，號界天，嗣法吳雲法曇，爲東皋心越（一六三九—一六九五）之嗣孫。他在《注石門文字禪題辭》中，言及廓門「嘗事大父心老人有年，予相識四十年」，他所說的「大父心老人」當即東皋心越，這對廓門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道昶著有《具戒尺名》十五卷、《和江湖集》、《和祇陀偈集》、《和三籟集》三卷等。

月潭道澄（澈）（一六三六—一七一三），黃檗宗僧人，黃檗宗二世獨照性円（一六一七—一六九四）法嗣。能詩文，著有《禪悅集》四卷、《龍巖集》四卷、《峨山稿》二卷、《巖居稿》六卷、《心華剩稿》五卷等。

廓門的師承和交游，大多具有博學兼通、能詩善文的特徵，這多少也能反映出廓門的學術品格。

二、《注石門文字禪》的學術淵源及產生背景

廓門在《跋注石門文字禪》中曾引用一道友的話：「師既新豐末裔，詎不注洞上書錄而鑽他故紙乎？」^{〔九〕}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八〇一—八六九）禪師在唐大中末年於江西高安新豐山接誘學徒，故「新豐末裔」即指曹洞宗門徒。這句話隱含了兩層意思：其一，禪宗強調佛法是不能形諸語言文字的，曹洞宗也不例外。良价禪師就說：「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一〇〕}神贊禪師說：「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一一〕}尤其是到了南宋，以天童正覺禪師為代表的曹洞宗，特別強調「默照禪」，這曾被臨濟宗的宗杲禪師諷刺為「聞說佛法禪道不在言句上，便盡撥棄，一向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靜坐觀心默照」^{〔一二〕}。日本道元禪師入宋，為如淨禪師法嗣，便將曹洞宗帶進日本。而「只管打坐，一般認為即日本曹洞宗的最大特色」^{〔一三〕}，也可以看出這與宋代「默照禪」的聯繫所在。因此，作為曹洞宗徒，似乎不應該從事解釋語句的工作。其二，即使要從事語句注釋，作為「新豐末裔」，也應該以本宗祖師的語錄為對象，而不應為臨濟宗的惠洪詩文集作解釋。這就引發出一些問題：禪宗以「不立文字」為標榜，何以日本禪宗僧人如此熱衷於類似儒家的經典注釋工

作？日本曹洞宗除了「打坐」的傳統之外，語句詮釋可是其另一傳統？日本的曹洞宗與臨濟宗除了有對立的一面，是否也有融合的一面？這些問題歸結到一點，就是《注石門文字禪》的學術淵源和產生背景。這就需要對日本的禪宗史稍作回顧。

日本的禪宗是由榮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和道元先後傳入，前者於南宋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入宋求法，接受了臨濟宗黃龍派第八代嫡孫虛庵懷敞的禪學，後者則將曹洞宗帶入日本。在禪宗的發展史上，宋代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五《五燈會元》提要指出：

禪宗自慧能而後，分派滋多。……學徒傳授，幾遍海內。宗門撰述，亦日以紛繁。名爲以不立語言文字爲不二法門，實則轆轤紛紜，愈生障礙。蓋唐以前各尊師說，儒與釋爭。宋以後機巧日增，儒自與儒爭，釋亦自與釋爭。（四）

因此，儒釋的對立轉而爲儒釋兩家內部的衝突所取代，成爲矛盾的焦點。榮西等人將禪宗傳入日本，也就同時帶進了這種風氣^{（三五）}。因此在日本禪宗史上，「濟、洞之諍」也是長期存在的現象^{（三六）}。反之，持「儒釋一致論」的僧人則比比皆是。久須本文雄《日本中世禪林之儒學》一書，討論了鎌倉時代、吉野（南北朝）時代、室町時代、安土桃山時代共二十一

個僧人的思想和學問傾向，他們對於四書五經有著普遍的閱讀和理解，對於「儒釋一致論」有著很强的認同感。該書在「結語」中有如下總結：

虎關師鍊，《詩經》《書經》《易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荀子》、
儒佛一致論。

雪村友梅，《書經》《大學》《孟子》。

夢窗疏石，《詩經》《書經》《易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中巖圓月，《易經》《禮記》《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荀子》、儒佛合論。

義堂周信，《詩經》《書經》《易經》《春秋》《禮記》《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儒佛一致論。

絕海中津，《詩經》《書經》《易經》《春秋》《禮記》《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荀子》。

仲方円伊，《中庸》。

岐陽方秀，《易經》《大學》《論語》。

惟肖得巖，《禮記》《大學》《論語》。

東沼周曦，《中庸》《論語》《孟子》。

雲章一慶，《大學》《論語》、儒佛一致論。

韜之慧鳳，《易經》《中庸》《論語》、儒佛一致論。

季弘大叔，《書經》《易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儒佛一致論。

桃源瑞僊，《詩經》《書經》《易經》《春秋》、儒佛一致論。

横川景三，《詩經》《書經》《易經》《中庸》《論語》、儒佛一致論。

景徐周麟，《詩經》《易經》《論語》《孟子》、儒佛一致論。

月舟壽桂，《易經》《大學》《論語》《孟子》、儒佛一致論。

策彦周良，《易經》《論語》。

桂庵玄樹，《書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儒佛一致論。

文之玄昌，《易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一七)

進而論之，日本五山時期的僧人所吸收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宋學，特別是朱子學^(一八)。當時日本僧人在學禪之餘，亦學朱子。在許多人看來，宋學、朱子學和禪學是有著內在相通之處的。義堂周信（一三二五—一三八八）《空華日用工夫略集》永德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條：

近世儒書有新舊二義，程、朱等新義也。宋朝以來儒學者皆參吾禪宗，一分發明心地，故注書與章句學迥然別矣。《四書》盡於朱晦庵，晦庵及第以大惠書一卷爲理性學本。（一九）

又九月二十五日條：

漢以來及唐儒者，皆拘章句者也。宋儒乃理性達，故釋義太高。其故何？則皆以參吾禪也。（二〇）

而在許多日僧的交往或師承中，也往往能够看到與朱子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榮西入宋，與竇從周、鍾唐傑相交，而竇、鍾皆爲從朱子學的儒者；俊苒（一一六六—一二二七）入宋，與樓昉、樓鑰相交，二樓則爲繼承二程學統的儒者，與朱子亦關係密切；一山一寧（一二四七—一三二七）師事頑極行彌，而頑極又嗣法於深通朱子學的儒僧癡絕道沖。一山本人的學問傾向就是「博」，其門徒虎關師鍊（一二七八—一三四六）撰《一山國師行狀》云：「教乘諸部，儒道百家，稗官小說，鄉談俚語，出入泛濫，輒累數幅。是以學者推博古。」（三）成爲朱子學在日本盛行的關鍵人物。日本僧人所認識到的朱子學的特點，便是以細密集成爲標誌。中巖圓月（一三〇〇—一三七五）《辨朱文公易傳重剛之說》云：

朱之爲儒，補罅苴漏，鉤玄闡微，可以繼周紹孔者也。（三）

萬里集九（一四二八——？）《曉風集》卷首云：

文公之詩，雖云一字片言，含蓄六經百家之秀，收拾四海九州之芳。內則仁義道德，外則比興雅頌，非易窮者也。

桂林德昌（？——一四九九）《桂林錄·除夜小參》云：

譬諸儒宗，則文武傳之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後，不得其傳。迨趙宋中間，濂溪浚其源，伊洛導其流，橫渠助其瀾，龜山揚其波，到朱紫陽集而大成。

所以，日本禪林的著述，也就具有朱子學的某些特徵。如桃源瑞僊的《史記抄》、月舟壽桂的《漢水餘波》、笑雲清三的《四河入海》、萬里集九的《帳中香》等，就是對《史記》、《漢書》、蘇軾詩和黃庭堅詩的注釋，皆詳贍細密，類似集注。蘭山道昶在爲《注石門文字禪》所作的《題辭》中，就比較了這一傳統：

然自古本邦禪林橫眼於風月者，頗喜讀蘇、黃詩，以講習爲己任。黃則有《帳中香》，蘇則有《四河入海》，亡慮若干卷。……夫蘇、黃之才，奎壁鸞鳳，天下之人無不宗焉。且參佛印、晦堂諸老，爲護法之屏翰，其所著文字，關係乎吾道，僅十一二。蘇、黃已如是，其餘不足論耳。……公出拔山扛鼎之手，鴻業就緒，如彼鼓吹蘇、黃，睥睨石門者，觀之亦可以不少愧乎？（二三）

雖然其意在揚此抑彼，但無意中也揭示了廡門此書與日本禪林著述傳統的某種聯繫。

如上所述，傳入日本的曹洞宗本來也是以「默照」爲特色的，夢窗疏石（一二七五—一三五二）在《西山夜話》中曾批評「或有自稱道人，不參知識，不看語錄，只管懺懺閑坐者」（三四），又云：「或有一類稱道人者，多是其器量不堪博學強記，故以閑坐爲功業，而不辨真實向道之心。」（三五）這顯然是針對曹洞宗而言。不過，日本中世的曹洞宗與臨濟宗也有很多交涉，並且吸收了臨濟宗的某些做法（三六），形成其自身的「抄物」傳統。所謂「抄物」，即指注釋一類的書，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傳統。只是和臨濟宗相較而言，中世曹洞宗的「抄物」都限在佛教範圍內（三七）。但「抄物」傳統的存在，也就表明不能僅僅以「打坐」之一端去認識和把握日本曹洞宗。因此，作爲曹洞宗徒的廡門《注石門文字禪》之產生，也應該在這樣的傳統中去認識和把握。

到了江戸時代初期，中世禪林的作風和傳統又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具體落實到與廓門相關者而言，其時代背景有如下可注意者：

首先是幕府推行對於學問的獎勵政策，於是各宗皆在江戸設立學寮，所學的內容包括宗學、佛教學和漢學。受此政策之鼓勵，曹洞宗也在江戸的吉祥寺、青松寺和泉岳寺設立了三個學寮，修學僧從數十人到數百人。而能够成爲諸大寺住持的標準，也就往往取決於其學問與修行。由於同時存在著禪林內部的競爭和作爲幕府官學的儒學對佛教的排斥，在這雙重的壓力下，曹洞宗有著強烈的渴望，亟待將本宗人材推向歷史舞臺^{三八}。因此，在學問方面也要採取博學的路徑，由內典向外書推擴。其中最爲傑出的代表，就是廓門所私淑的老師獨庵玄光，他曾引用永平元禪師的話說：「大凡學道人，其人廣學博究，其始如雖退，其終達道者多矣。其人孤陋寡聞，其始雖如勇銳，其終退墮者多矣。」^{三九}所以，在強調並實踐「博學廣究」方面，玄光是當時的一個代表人物，茲各舉日中雙方一例以證明他在外書方面的成就和所受到的高度評價。當時日本儒林古文辭學派的代表荻生徂徠（一六六六—一七二八），在其《護園隨筆》卷四中指出：

近歲僧玄光，博學涉古書，能屬文，此方諸儒所不及。（四〇）